

# 德性与“德性需要”的实现\*

◎ 张 旸

**内容提要** 德性是人在实践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具有价值特征和生命力量的内在精神品质。德性需要可以被理解为人对自身道德内在精神品质的依赖和要求。重视尊重德性需要的内容及其形成方式所具有的时代性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德性源发的生命性和自我性,任何道德内容的展现及其德性的形成都包含着与个体生命发展逻辑相一致的个人的选择和谋划,是个人追求美好和幸福生活的过程。

**关键词** 德性 德性需要

[中图分类号]B82-05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0447-662X(2012)05-0187-03

马克思认为,“他们的需要,即他们的本性”,<sup>①</sup>每个人都是根据某种需要和为这种需要的器官而行动。“德性需要”并不是“德性”的同义反复,正如“精神需要”不同于“精神”一样。

## 一、德性

德性的基本内涵虽然与道德有着紧密的关联,但自然秉性、精神力量、内在品质与德行等也是理解德性的关键词。

“德性”一词最早见于《中庸》“故君子尊德性而道问学”这句话中,这里的“德性”更多地指人的自然秉性。古希腊的柏拉图在他的理念论的基础上,将德性看作是存在于人身上的获得“一般的善”即“善的理念”的精神力量。亚里士多德认为将绝对抽象的善或德性视为脱离个别事物和行为而存在的观点是不合理的,至善是在现实生活中通过具体的德行而达到的。而且,亚里士多德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指出,“我们称那些值得称赞的品质为德性”。<sup>②</sup>

康德也认为,德性就是一种道德力量,是人之道德的最高目标,德性的实现表征着人的内在价值对普遍道德律令的敬畏、尊重和遵守。斯宾诺莎认为德性与力量是同一的东西,人的德性是人的本质或本性,或人具有的可以生产一些只有根据他的本性法则才可理解的行为的力量。麦金太尔认为德性是“一种获得性人类品质,这种德性的拥有和践行,使我们能够获得实践的内在利益,缺乏这种德性,就无从获得这些利益。”<sup>③</sup>

所以,德性可以被理解为在人的实践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具有价值特征和生命力量的内在精神品质。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2010年青年专项课题“‘教育需要’的现实困境及合理性建构研究”(项目号:10YJC880162)的阶段性成果。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60年,第514页。

②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03a10页。

③ [美]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175页。



首先,德性以道德为核心,但德性不同于道德,德性是人的内在精神品质。其次,德性必须在实践中表现出来,而且通过生活实践而达成,所以,德性与德行具有统一性。“我们通过做公正的事成为公正的人,通过节制成为节制的人,通过做事勇敢成为勇敢的人”,这样,“成就着德性也就是德性的实现活动”。<sup>①</sup>最后,德性是一种具有价值特性的生命力量。德性品质充满了力量,承认了德性的“卓越”及其“力量”,也就是认识到了德性的功利性特征和获得性意义,也就是说,从本质上看,德性是一种引导成功的好品质。

## 二、德性需要

德性需要可以被理解为人对自身道德内在精神品质的依赖和要求。人对德性的需要使人与动物区分开来,使人成其为人。至少从道德的角度上看,没有德性的人性会沦为兽性,而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性。

孟子在“人性本善”观点的基础上,认为“无恻隐之心,非人也;无羞恶之心,非人也;无辞让之心,非人也;无是非之心,非人也”。而且还认为,“人之有(为)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于禽兽。”《礼记·大学》中云:“富润屋,德润身”。德性作为在人的实践生活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以道德为核心的、具有价值特征和生命力量的内在精神品质,必然一方面将人和动物区分开来,一方面成就了人本身的生成。德性的价值可以在人类任何一切活动领域中展现出来,不管是在家庭生活或团体活动中,还是在经济活动或政治领域中,具有德性的人会在强烈的责任感和尊重他人的基础上,恪守自己的职责和履行自己的义务。

德性需要作为人对自身道德内在精神品质的依赖和要求,必须具体展现到德性需要的内容之中。《尚书》把“正直”、“刚克”、“柔克”称作为三“德”。孔子构建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体系。“仁”被孔子作为最高的道德准则,而且,“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忠”即“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恕”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阳货》曰:“能行五者于天下,为仁矣。”这五种品德“恭”、

“宽”、“信”、“敏”、“惠”,就是人的德性。孔子在主张以“仁”为最高道德准则的同时,认为应该以“礼”即包括政治等级制度、伦理道德规范、一切交往礼仪等礼制为道德规范,凡符合“礼”的道德行为,都要以“仁”的精神为指导,所以,“仁”和“礼”是培养有德性的人的道德教育的内容。

孟子在性善论的基础上,认为古代学校教育的目的“在于明人伦”,其中“人伦”即“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特别注重“五伦”中的孝和悌,并以此为中心,建立了由仁、义、礼、智、信组成的被称之为“五常”的道德规范体系。董仲舒继承并发展了孔孟的思想,把“三纲五常”作为道德教育的中心内容,认为“三纲”是道德的基本准则,“五常”是与个体品德的知情意行等相关的道德观念。朱熹在提出“存天理,灭人欲”的道德目标的基础上,依然认为道德教育的内容为“三纲五常”,而且认为可以通过立志、居静、省察、力行等方式来实施道德教育,使“五常”成为人的德性的核心。

在西方,荷马史诗中的奥德修等英雄人物身上,就体现出了希腊人所认为的最高尚的德性,即智慧、勇敢、节制和正义。苏格拉底在提出“美德即知识”的伦理命题的基础上,把人在生活世界中所表现和实现的卓越品质如勇敢、虔诚、正义、节制等视为美德。柏拉图在“善的理念”的基础之上,认为作为善的伦理共同体的国家应该具有智慧、勇敢、自制、正义四种美德,而个人的灵魂以普遍的一般的精神作为其德性品质获得的基础。正义对四种美德具有统摄作用,正义就是在国家中做正当的事情。亚里士多德认为德性即幸福,人的生活的善就是合乎德性的现实活动,幸福就是合乎德性的生活实践。而且,真正的德性就是选择情感和行为的“中道”。笛卡尔曾给自己制定了几条道德准则,即守法、敬神、坚定、审慎、克己、寡欲、追求真理,这也可以被看做是对道德内容的讨论。

<sup>①</sup>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103b1-3、1105a16页。



### 三、德性需要的实现

人的德性需要及其内容应该具体落实在一定的实践过程开展之中,而且道德的呈现方式必须与人的生命展开的逻辑相契合,这才能达成德性需要的实现。

孔子认为,“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他主张通过立志、克己、力行、内省等原则来形成人的德性。孟子认为理想人格主要依靠“持志养气、动心忍性、存心养性、反求诸己”等人的内心修养来实现。苏格拉底“美德即知识”的命题并不是表现为道德规则的外在灌输与塑造,而是在讨论式的对话中实现对话者双方精神的提升和德性的升华。柏拉图认为,如果每个人通过克制欲望,既智慧又勇敢地在国家中做好自己分内的事情而不去干涉他人,那么这样的人就是具有德性的人,这样的国家就是正义的国家。

在亚里士多德这里,德性的形成过程就是人在理性智慧的指导下选择适当的行动和情感的过程,也是德性内容的显露过程。笛卡尔认为,人人皆有天然的良知,但天然的良知只有受到理性的控制,人才能正确地应用它。斯宾诺莎认为自我保存是人的本性,也是德性的基础。但真正的德性在于依照理性的指导而生活。在康德看来,人是一个有理性的存在者,只有理性才能决定人之为人和人的道德价值。人是目的,道德本质上是自律,绝对命令是最高道德原则,遵循绝对命令是善良意志之善的最高表现。

不管是中国古代还是古希腊对德性需要的内容及其展开方式的讨论和实践,都具有较强的时代气息和历史特质。它们追求对人的德性的仁爱、宽容、正义、节制等高贵品质需要,强调人自身的自律、养性、力行、理性等德性方式,对于思考德性需要的内容及其方式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但是,中国古代强调个体德性修炼中的主动性是隶属于家、国、天的伦理秩序之中的被规定了方向与内容的具有强烈占有性的主动性。西方当代以前的理性主义道德传统以理性的道德理想为核心,体现了对理性需要的伦理辐射。这种理性伦理的理想造就了道德和德性的

总体性和终极性,导出了道德的“绝对命令”和绝对准则。

于是,“在这样的道德总体性中,由于惟一性的道德真理统摄道德实践和道德主体,试图达到一致性的崇高理想,所以一切差异、一切不利于善和崇高的东西都必须抑制,如身体、感性、甚至生命的活泼等必须在道德的准则及其无形的约束中受到压制,一切不符合历史或现实的道德目的行动和品质都受到禁止。”<sup>①</sup>当然,至少在德性需要的层面上展现出这样的偏执性。因此,尼采在“上帝死了”、“重估一切价值”的呼唤中,用体现权力意志的“超人”隐喻来要求道德作为激发生命意志的一种方式,从而试图在批判驯化的奴性道德的基础上对其进行超越。于是,在尼采的德性需要中,具有冲动和激情的生命意志成为人为了生命自身而成就生命意志的道德的核心,道德因此被放置于生命之中,德性具有了回归生命的伦理。

因此,在尊重德性需要的内容及其形成方式所具有的时代性的同时,更应该看到德性源发的生命性和自我性,任何认为德性的形成仅仅只具有从他律到自律的唯一路径的内容和形式都是对德性需要的片面的理解。因为任何道德内容的展现及其德性的形成都包含着与个体生命发展逻辑相一致的个人的选择和谋划,是个人追求美好和幸福生活的过程,不过这种选择、谋划和追求在当下必须体现在公共理性和公民德性之中。“公共理性并不是一种超越个人的道德‘大我’,它仅仅是在个人的道德能力和理性能力基础上形成的能够保证公共生活的合作正常开展的一种方式。这种方式是由个人的理性和道德在自由发展中而构成的,它不排斥公民个人在追求个人的美好生活的观念和道德价值的取向中的自由。”<sup>②</sup>

作者单位:陕西师范大学教育学院

<sup>①②</sup> 金生鈇:《德性与教化——从苏格拉底到尼采:西方道德教育哲学思想研究》,湖南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9、306页。

